

新芽沙龙·第10期

去殖民、民族国家、冷战及东南亚威权主义的崛起

2019年11月4日

2019年11月4日，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和外国语学院合办的“新芽沙龙”东南亚名家系列第一期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期沙龙邀请到荷兰莱顿大学特聘教授、皇家东南亚加勒比研究所（KITLV）主任 Henk Schulte Nordholt 作主题为“去殖民、民族国家、冷战及东南亚威权主义崛起（Shining Future, Imminent Dangers: Decolonization, Nation-States, Cold War and the Rise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Southeast Asia, 1940-1980）”的学术报告，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国内外师生到场聆听，参与讨论。沙龙由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谢侃侃主持，评议嘉宾为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饶兆斌。

主题报告基于 Nordholt 教授近期的研究成果，探讨了1940-1980年间，东南亚民族国家兴起和国族构建过程中经历的一次次冲击，以及冷战在其间发挥的作用。

Nordholt 教授首先从最基本的东南亚版图谈起。他指出，东南亚理应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但遗憾的是，学者们受制于各自所学语言，常常只专注于自己的对象国。我们应该跳脱出这一传统限制，建立一个更为广阔的知识框架。

Nordholt 教授进一步介绍了东南亚国家的去殖民进程。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纷纷宣布独立，但从1946年菲律

宾建国到 2002 年东帝汶脱离印尼成为独立国家，半个多世纪该地区经历了坎坷而漫长的去殖民化过程。泰国是东南亚国家中唯一一个名义上未受任何西方列强殖民的国家，但同样深受殖民影响：在英、法两国压力下，泰国在领土、经济、政治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让步。

Nordholt 教授认为，虽然东南亚各地实现独立的方式各异，但存在几个共同点，即（1）日本占领发挥了重要影响；（2）大多数国家通过“协议”获得独立；（3）新兴民族国家基本承袭了前殖民地的领土与边界。

首先，日本推行的“南进政策”及二战中后期（1942-1945）对东南亚的占领，促使其在该地区的势力全面扩张，加速了欧洲殖民统治在东南亚的覆灭。其次，除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外，缅甸、老挝、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国均是通过与前殖民宗主国谈判，通过协议取得独立的。此类谈判往往历时数年，虽然各国最终都可以获得名义上的独立，但在谈判中却没有太多主动权，协议在很大程度上依旧维护了前殖民宗主国的利益。最后，东南亚的新兴民族国家几乎完全沿用了殖民宗主国在 20 世纪初划定的地理边界，而边界内种族、宗教、语言等方面的多样性在以印尼、马来、菲律宾为代表的海岛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虽然中南半岛各地大多依托单一强势民族建立民族国家，但由种族、宗教等因素引发的冲突却是屡见不鲜。东南亚各国内部有着根深蒂固的矛盾，加之日本占领、民族主义运动和冷战等多重因素的催化，成了一个易于滋生暴力的区域。因此，暴力是东南亚各地解决政治问

题的惯用路径。相应地，军队也成为该地区一次次政治风暴中从未缺席的角色。

对于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的构建，Nordholt 教授认为，想要了解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及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就必须知道这些新兴国家运作的逻辑本质。殖民时期，东南亚各地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但由于殖民者无法直接管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区域，他们便与当地精英阶层合作，从当地获取原材料和劳动力，以赚取高额利润。可以说，无论是殖民地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各类政策的制定都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根本目标。相比之下，殖民政府在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投入是远远不足的。仅有一小部分殖民地的上层精英拥有特权，可以从这样的畸形经济模式中获益，普通百姓则备受剥削之苦。二战后，东南亚各地百废待兴，新兴民族国家的第一代政治领袖们虽然面对重重困难，却都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通过努力改变东南亚落后的社会面貌。

然而，Nordholt 教授指出，只有希望是远远不够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国家面对着众多棘手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如何使国家从压制人民的工具转型为激励生产的系统；（2）如何将当地经济从开发（*exploitation*）转向发展（*development*）；（3）如何将宗教、种族分裂、冲突不断的殖民地变成各种群体和谐共处的国家。

事实上，东南亚各地的分化与割裂在殖民时代就已形成，很多矛盾在民族国家建立后反而更加根深蒂固了。政治上，后殖民时代的军队延续了殖民主义的影响，从未在

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事务中缺席。他们曾是殖民体系的维护者，在独立后摇身一变成了民族国家的维稳力量，以“国家安全”为名对抗反叛者和潜在的分离主义者。经济上，50年代初朝鲜战争对物资（如橡胶）的巨大需求短暂刺激了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但该地区仍旧受投资短缺和改革不力的影响停滞不前，走私、贪污等问题从未得到有效遏制。

Nordholt 教授展示了一组讽刺漫画，描述了印尼在经历了 350 年荷兰殖民、3 年半日本占领后取得独立却陷入了贪污腐败的危机中。除了在经济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东南亚的政治家似乎对民主并不感冒。他们认为人民还没有足够的政治意识参与票选，因而需要领导和控制。上层精英们普遍对民主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殖民之前，统治者和被统治阶层遵循了一种恩庇侍从（Patron-client）关系；殖民时期，西方殖民者与当地精英则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取得独立后，东南亚民族国家的领袖们和他们的政党逐渐走上了这条道路——集权代替民主成为了这一时期东南亚新兴国家中最为普遍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的不满不断酝酿，在这样的国家中滋生了更多的种族、宗教和阶级冲突。

除此之外，东南亚各地还需面对很多其他问题。例如在国族构建中，语言、教育制度需要不断调整，民族英雄、国家象征需要重新塑造，新的历史叙事也需要重新编写。另外，各国还需要在外交方面积极努力，寻求通过建立新的同盟关系以获得安全保障。脆弱的政权组织形式，

充满争议的经济制度也使得这些新兴国家举步维艰。种族和地区间冲突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加剧，例如很多东南亚华人一度面临无处可去的窘境，在半岛地区被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称之为赞米亚（Zomia）地区的山民们也被民族国家一步步边缘化。新兴国家在建国初期举步维艰，而各国在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的过程中却又沿用了殖民时代的专制手段，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让情况雪上加霜。

随后，Nordholt 教授谈到在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冷战的大背景下，东南亚的民主化进程几乎完全停滞，大规模暴力事件接二连三地在该地区发生。1947 年，泰国军方率先通过政变上台。紧接着，印尼、缅甸、南越、柬埔寨、老挝、菲律宾等地发生了一系列政变或内斗，民主化进程停止，随之开启了各地的威权统治。只有马来西亚联邦和新加坡还保留着名义上的选举制度，却也只是一党专政下的民主。

在冷战的影响下，东南亚成了一个狼烟四起的“多事之地”，国际上的紧张局势与冲突在这里集中爆发，暴力与屠杀事件相继发生。Nordholt 教授认为，著名东南亚研究学者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在著作中对冷战的态度是值得商榷的。他指出，瑞德教授淡化了冷战对东南亚的影响，但事实上，冷战因素恰恰在东南亚的这一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冷战是世界性的，两个庞大阵营的激烈对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没有国家能够选择中立的位置全身而退，大部分国家都选择了其中一边，并且得到美国或

者苏联的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泰国和缅甸军方都因其反共立场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支持。1948年，亚洲青年会议在加尔各答召开，东南亚的反左翼情绪空前高涨，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相继在其境内开展了反共斗争。1954-1975年间，东南亚半岛地区发生了以印度支那军事冲突为代表的一系列大规模暴力事件。印尼也在1965年末开始了对左翼势力的清洗，印尼军方和准军事团体肆意对印尼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进行屠杀。在这些事件中，新政权几乎都通过极端暴力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旧政权几乎都遭到了清算。1975年4月，西贡的陷落对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担心左翼势力的威胁，军队、王室和中产阶级形成联盟，开启了新一轮的威权统治。1975年，印尼在美国的支持下入侵东帝汶，并受到西方阵营的舆论支持。

冷战期间的暴力事件在东南亚造成了巨大伤亡，但具体数字却从未得到系统统计，有学者估计伤亡人数大概在五百万到七百万之间。这一数字几乎和二战时全欧洲的死亡人数相当。然而，Nordholt教授认为这一数字可能被大大低估了，因为此类统计大多只关注了印尼、柬埔寨等地的案例，而冷战在该地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未统计的伤亡不计其数。他同时提到，人们对冷战中大规模暴力事件始终缺乏关注，对这些冲突和屠杀的记忆似乎也在慢慢消退，这些现象是需要我们警醒的。

东南亚地区的威权统治在70年代达到高潮。泰国、緬

甸、南越（1975 年之前）是军政府统治，印尼的威权政府也含有大量军队成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是象征性的民主制度；1975 年之后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则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东南亚的几个社会主义政权试图照搬苏联发展模式，关注集体农业和重工业，然而经济发展却没有太大起色。资本主义国家则依靠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在国家内部强调政商联合，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20 世纪末，冷战的结束催生了一波新的民主浪潮。然而，成长于威权时代的东南亚人民，尤其是新兴中产阶级渴望社会的长久稳定，似乎更愿意维系威权统治，以求在逐渐开放的市场中获取经济利益。东南亚各国经济在这段时间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仍然要面对人口、环境等多种问题，该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也不得不在各种困境中继续摸索，缓慢地向前推进。最后，Nordholt 教授强调冷战对于东南亚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时至今日，东南亚各国仍然需要解决一系列棘手的冷战遗留问题。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饶兆斌对报告进行评议。他认为，Nordholt 教授的报告启发性很强。东南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地区，Nordholt 教授对东南亚的全景展示是很有意义的。这种突破地理边界、将内部差异明显的东南亚各国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并探讨。饶兆斌教授补充了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强调中国—东南亚关系对东南亚形势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可以将东南亚和中国放入一个比较的框架下进行审视。虽然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二战后的国家建设中都经历了各种困难和挑战，但

中国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其次，中国在东南亚各国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且持久的作用。饶兆斌认为，冷战期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冷战时期，中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最后他强调，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是多样的且复杂的，研究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进行。

参加沙龙的师生也进行了现场互动，就前殖民宗主国在民族国家构建中扮演的角色，东南亚国家与中美关系，威权统治在东南亚国家建设中的必要性等问题与 Nordholt 和饶兆斌两位教授进行了深入探讨。两位教授耐心细致地为同学们进行了解答，丰富了讲座内容，给同学们极大启发。最后，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谢侃侃进行总结发言，梳理了 Nordholt 教授报告中所涉及的几个重点问题，再次强调将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整体进行研究和比较的必要性。

新芽沙龙·第 11 期

互动与皈依：东南亚华人信仰体系构建中的三个历史时刻

2019 年 11 月 25 日

2019 年 11 月 25 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和外国语学院合办的“新芽沙龙”东南亚名家系列第二期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期沙龙邀请到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AS）前主席 Barbara Watson Andaya 作学术报告，主题为“互动与皈依：东南亚华人信仰体系构建中的三个历史时刻”，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谢侃侃主持。

Andaya 教授是世界著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先后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荷兰工作，自 1994 年起在夏威夷大学任教，于 2000 年获得了 John Simon Guggenheim 奖。她的代表作包括《马来西亚史》、《东南亚近代史》、《燃烧的子宫：重新定位东南亚历史中的女性（1500-1800 年）》等。Andaya 教授目前的研究课题关注 1511-1900 年间东南亚地区的宗教互动。她在报告中分享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解释了 20 世纪前基督教在东南亚华人中发展相对缓慢，在 20 世纪上半叶却得到迅速扩张的原因。

关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情况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相比之下却少有学者关注基督教在海外华人社群中的影响。而在 16 至 19 世纪，东南亚华人社群恰恰是基督教传教士

试图打开中国大门的试炼场。Andaya 教授对 17 世纪西属菲律宾、19 世纪英属海峡殖民地和 20 世纪 30 年代英属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群岛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只有具备成熟的历史条件，外来宗教才能在该地区得到实质性的发展。该研究旨在对宗教交流中的全球互联进行梳理，并将东南亚地区的宗教互动置于全球史框架内进行分析。

Andaya 教授展示了一幅由耶稣会士马里尼神父（Giovanni Filippine de Marini SJ）于 1665 年从东方回到罗马后所作的版画，其中 IHS 是耶稣基督的象征，在希腊语中是耶稣名字 ΙΗΣΟΥΣ 的缩写。匍匐在主的恩泽里的是来自越南北圻、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和日本的信徒，这幅画传递出耶稣会士期望基督教在东方遍地开花的愿景。有趣的是，传教士用以传教的书本是用中文写成的。Andaya 教授借由这一现象引出了进一步的分析。

17 世纪的马尼拉

当西班牙人在 1570 年开始其对马尼拉的占领时，当地仅有约 150 个华人。而到 1600 年，当地的华人数量则增长到了约 2 万，其中大部分都是 1567 年隆庆开关后从泉州和漳州漂洋过海而来的。华人在西班牙人的要求下聚居在马尼拉要塞边上的帕里安（Parian），并在 1565 至 1815 年间横跨太平洋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者角色。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漆绘与雕刻工艺品经由马尼拉被运往大洋彼岸的墨西哥，而来自福建的商人们则从中赚取了美洲白银。

耶稣会士早在 1552 年便将传教网络拓展到了中国，但

其他基督教派却寻路无门，其中就包含了西班牙的多明我会。因此，1587 年来到马尼拉的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将马尼拉视为一个向中国传教的跳板，并首先尝试在当地的华人社群中进行演练。

当时，从福建南下前往马尼拉的除了商人与手工艺者外还有一部分文人学者。据记载，一位名为胡安·科博（Juan Cobo）的多明我会传教士正是在福建文人的帮助下获取了福建的相关知识，并用文言文著成了《万能真神实录》。该书将上帝塑造为万物的创造者，并记录了传教士如何将基督教教义与自然科学糅合在一起。《万能真神实录》仅有一份副本留存至今，现珍藏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国家图书馆。此外，当地华人与西班牙传教士之间的互动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1593 年一位华人印刷了用西班牙语和他加禄语写成的《基督教教义》（*Doctrina Christiana*）。另外，科博在其宣教的材料中创造性地融入了一些动物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他将自然规律与上帝的创造性糅合在一起，不同动物在食物链中的关系被体现为上帝造物的神奇体现。

来自福建的华人多以闽南语为母语。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们相信方言能够帮助他们吸纳更多的华人信徒，从而搭建一条通往中国的传教之路，因此开始积极地学习闽南语。在当地华人的影响下，传教士们在 1605 年印刷的一版《基督教教义》中使用了大量闽南方言，包括明代福建方言中的特有字符。此外，马尼拉华人掌握了高超的雕刻技艺，协助制作了大量宗教雕像，得到传教士们的认可。这

些雕像成为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商品，当时马尼拉教堂中的许多宗教工艺品都出自华人之手，例如圣母玛利亚的雕塑和用象牙雕琢的沉睡的耶稣。

在传教士的努力下，确实有部分华人皈依了基督教，因为皈依能够带来一些切实的好处。例如，华人基督徒在 1596 年被允许离开马尼拉；1626 年西班牙免除了华人的额外劳役，且在皈依后的十年里无需向西班牙人交税。但这些措施的效果十分有限，无处不在的歧视、赋税以及繁琐的皈依仪式让大多数华人对基督教望而却步。西班牙殖民当局允许皈依了基督教的华人与当地人通婚，他们的后裔成为了后来菲律宾社会的梅斯蒂索（Mestizos）群体。到 1662 年，当地两万多华人中只有约 15% 皈依了基督教。因为西班牙的种族歧视政策，马尼拉华人在 17 世纪初发动了数次起义，矛头直指当地基督教会，并且将传教士和教堂内的艺术品作为打击和毁坏的目标。

总体来说，尽管西班牙人在 17 世纪初的马尼拉努力传教，但因历史条件尚不成熟，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根据毕农多（Binondo）教堂 19 世纪 80 年代的记载，当地的华人居民中也只有约 4% 皈依了基督教。菲律宾华人基督徒的数量直到 20 世纪初美国占领时期才有了显著增长。

19 世纪早期的马六甲与新加坡

Andaya 教授将视角转向 19 世纪早期的英属海峡殖民地。当时，马六甲和新加坡居住着大量华人，马六甲居民中约四分之一是华人或峇峇（Baba，指华人与马来人的后裔），而在新加坡居民中华人占比约为 31%，大多数来自福

建或潮汕地区。1815 年，以英国人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为代表的第一批传教士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华人助手抵达马六甲。米怜的助手梁发（Liang Ah Fa）帮助翻译及印刷了许多传教材料，并成为了当地第一位华人牧师。

米怜是马六甲地区传教活动的总负责人，与科博相似，他坚信基督教能通过马六甲传向东南亚各地并最终到达中国。不同的是，米恩看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教育能够帮助华人更好地理解并接受基督教的教义，因此他在马六甲建立了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他希望新一代华人能够在此接受教育并皈依基督教，并最终成为神职人员投身于他们的传教大业。米怜通过书院印刷了很多书籍，如圣经和他创作的小说《张远两友相论》。这些书籍成为了他在马六甲以外进行传教活动的重要工具。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传教士是里雅各（James Legge）。他于 1840 年被英国新教公理宗的伦敦传道会派驻马六甲主持英华书院。里雅各对于中国儒学和传统文化保持着敬畏之心，且认为在中国古代经典里同样蕴含着基督教的精神。1843 年，他解散了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并前往香港，在当地创立了新的英华书院。两年后，他带着三名中国男生回到了英国。在其中一名男生的协助下，里雅各在新加坡建立了一座新教堂。

当时新加坡的情况与 17 世纪的马尼拉相似，当地华人很少以放弃自身传统文化为代价投身于一个全新的宗教信仰。许多上英华学校的孩子都希望能够学习商务英语，以方便他们从商并继承家业，基督教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很大

的吸引力。尽管新加坡教会发行了诸多中文传教书籍，华人基督徒的数量依然没有快速增长。中华传统文化仍深深地扎根于海外华人社群，而皈依意味着信仰体系的全面重塑，很多华人不愿轻易切断自己的文化及精神血脉。另一方面，以基督教为旗号的太平天国运动客观上造成国内民生凋敝，中国国内的反基督教情绪也蔓延到了海外。此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口岸，传教士们得以前往香港等地传教。Andaya 教授强调，历史环境让 19 世纪英国人在海峡殖民地的传教活动遭遇了跟西班牙人相似的困境。

宋尚节（John Sung）的传教活动

相比之下，20 世纪 30 年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东亚地区的基督教复兴运动，美国五旬节派（Pentecostalism）的崛起，清王朝的覆灭等因素共同作用，为华人宗教领袖宋尚节在东南亚的传教活动搭建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舞台。1907 至 1910 年间的平壤复兴运动让基督教在朝鲜半岛得到了广泛的传播。Andaya 教授认为，学者们需要将这次复兴运动放到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中进行考察：1906 年，美国洛杉矶的阿苏萨街运动推动了五旬节派在美国的发展。五旬节派强调传教活动的参与性和表演性，对当地社会中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在五旬节派传教活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正在发生剧烈变迁的中国成为了传教士眼中重要的目的地。西方传教士将 1911 年清王朝的覆灭看作是一个传教的黄金时机。然而，各地华人将传教士看作殖民势力的一员，普遍

对他们抱有敌意。与此同时，华人自发的传教活动却提高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且推动了教堂在各地的兴建。

1901年，宋尚节出生于福建莆田，父亲是当地一所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其家庭受到了当时基督教复兴运动的深刻影响。宋尚节从年幼时期起就积极参与布道活动，在当地小有名气。青年时期，宋尚节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求学，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取得了化学博士学位，后前往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在此期间，他被基督教基要派和现代派之间的辩论所吸引，并受到福音音乐的影响，逐渐创立出一套新颖的传教方式。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女传教士于尔丁·尤特莉（Uldine Utley）利用歌唱与演绎的方法传教，给宋尚节留下了深刻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宋尚节的美国留学经历并未让他产生对西方传教士的亲近感。相反，他认为只有当西方传教士离开后，中国本土的教堂才能够进一步发展。

宋尚节于1927年回国，很快组建了伯特利布道团（Bethel Worldwide Evangelistic Band），不久后便声名远播至东南亚地区。这一时期，东南亚华人正经历着重重困难：在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当地排华浪潮激发了华人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华人也成为原住民民族主义情绪的发泄对象；全球经济大萧条让诸多矿山和种植园倒闭，殖民地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随之下降；殖民政府对华人移民严加控制，许多人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窘境。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当地华人教会损失了大批信徒，入不敷出、每况愈下，急需一道能拯救他们的曙光。宋尚

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邀请到东南亚地区进行传教的。

宋尚节的传教更近似一种“剧场式”的布道，他能够以生动的表演和互动来阐释晦涩的教义。例如，他让观众背负一个小棺材，在棺材内放入象征原罪的石块，每承认一项罪过就放入一块石头直至观众无法站立。之后，他缓慢地将石头取出，用这一过程体现灵魂的净化与重生。此外，宋尚节还能使用马来语或闽南方言演唱歌曲。他这种戏剧化的传教方式流露着来自美国五旬节派和福音音乐的影响。当地媒体纷纷报道宋尚节的传教活动，将他在当地掀起的热潮称作奇迹，认为他的布道给遭受苦难的华人群体提供了一个治愈的港湾。

宋尚节的布道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东南亚华人间因方言不同而存在的裂隙。在他布道的“剧场”中，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华人都能共享同一种神圣的情绪，一种共有的“华人”身份。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宋尚节的宗教宣讲与当地华人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了有机结合。此外，他强调皈依基督教与保留文化传统并不冲突，鼓励华人教堂接纳更多的中华民俗传统。这一主张在英属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群岛受到了华人社区的热烈欢迎。

基于上述三个案例，Andaya 教授对基督教在东南亚地区华人群体中的传播进行了进一步的比较与梳理。她指出，基督徒依然是东南亚华人中的一个少数群体，分析他们信仰的转变必须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历史学家在研究中也要特别重视人们在宗教互动中所处的历史环境。

她认为，对东南亚华人基督教史的研究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我们有必要将影响宗教与社会变革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尤其是将它们放置到全球化和比较的视野中进行探讨。

新芽沙龙·第12期

危机与希望：探索东南亚史在社群、国家及区域间的再平衡

2019年12月10日

2019年12月10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和外国语学院合办的“新芽沙龙”东南亚名家系列第三期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期沙龙主题为“探索东南亚史在社群、国家及区域间的再平衡”，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ARI）副主任、东南亚史学家 Maitrii Aung-Thwin 教授就东南亚历史研究与学生交流。沙龙由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谢侃侃主持。

Aung-Thwin 教授首先对其长期从事的东南亚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进行了反思，并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他认为，一部能够涵盖各个方面的历史课程，应该有足够的空间感，可以容纳不同的人的世界观、不同的人对过去的看法以及他们本身不同的经历。

Aung-Thwin 教授指出，主题中的“社群”概念，不仅是一个可以用来描述一群人的术语，它也可能是一种思考历史的方式，用来思考东南亚历史，尤其是有关缅甸的历史。当我们想到缅甸的时候，很容易联系到东南亚，例如，从社群的角度来考虑东盟共同体和东盟的一体化，这也是社群一词的主要用途。但是社群也可以指代其他一些事情，比如我们总是谈论社群和危机，用社群出于社会、经济或政治因素等来定义危机；有时我们也会提到“边缘社群”，

不管是由种族、宗教、性别、阶级、居住地还是人们自己的经历来定义，社群通常被用来谈论整个范围内的特定经历。社群也可以有积极的释义，它也可以用来谈论社群的承诺和展望，无论是在非常小的层面还是更高层面，我们可以谈论一个国家的社群，一个区域的社群，甚至只是一个地方的社群。这也可以成为我们思考东南亚历史的一种方式。

过去的一年，新加坡庆祝了建国 200 周年。传统意义上，新加坡的历史始于斯坦福·莱佛士爵士，一个英国殖民官员。但实际上，在庆祝的过程中人们并没有对他有太多的纪念，而是重新思考着历史中的其他社群因素。比如某个团体立了许多雕像来代表新加坡不同的过往，这些雕像中有马来人物（他们的关键历史人物），有的还代表当地的中国人、印度人等等。所以，历史上新加坡作为一个社群的概念仍然是存在争议的。

缅甸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社群，存在着许多关于过去和现状的问题。当东盟国家聚集在一起，作为一个地区推进一体化的时候，它却遇到了更多地方性和国家性的推进矛盾。因此，虽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主体，已经走上了自己发展的正规，但缅甸人也在不停思考，作为一个缅甸人意味着什么？谁属于或者谁不属于这个国家？什么历史能够或者不能代表这个国家？谁又属于或不属于这些历史？想明白这些问题仍然是一个正在进行时。

再比如在菲律宾人物拉普拉普雕像的照片中，能够看到麦哲伦遗产标志。麦哲伦和他的船员在 16 世纪环游世界各

地，但死在了菲律宾。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从来没有成功环游过全世界，因为他不幸被菲律宾人拉普拉普杀害了。但在民族主义浪潮和试图自我界定的浪潮中，菲律宾人树立拉普拉普雕像是为了纪念他和菲律宾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Aung-Thwin 教授表示，上述例子呈现的是有关民族国家历史的问题，以及研究者是如何看待他们的问题。他认为，有一种思考方式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即包含民族历史以及其他类型历史（涉及社群历史）的方法。

从民族国家历史的角度看，它们呈现了什么内容？为什么要写民族国家历史？因为他们希望展示并取代那些殖民者和殖民历史——后者基本上讲述了东南亚殖民帝国的故事，其目录的结构，重要的时期以及特别章节的标题往往是来自于欧洲人在东南亚的经验。所以，当二战后独立国家出现时，人们就有一种冲动要写回去，在历史上重新占有一席之地。因此，许多编写民族国家历史的学者所做的，就是替换角色——把欧洲“演员”们替换为当地的土著民族。这些历史倾向于强调国家的内部动态、国家结构和优先事项，通过民族国家历史对东南亚历史产生影响。

但是很多人，特别是在西方，认为民族国家历史没有全面地反映广泛的经验。许多人基于这样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有许多少数群体，无论他们是按种族、宗教、阶级、性别、地点、经历还是政治来划分，他们的故事往往被边缘化，而且他们也并不经常被纳入国家历史叙述中。此外，这些历史也倾向于忽略与中央政府或主要精英等无关

的非国家叙事体的历史。从空间因素看，那些在农村地区或边远地区生活的人们故事和经历，通常也容易被忽略，或者说不会给予他们与主体民族相同的待遇。Aung-Thwin 教授认为，这种情况当然会发生，而且这也是一些西方人对美国历史的提出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处理好民族国家历史和地区历史的关系。

Aung-Thwin 教授表示，尽管区域研究发展于北美，但世界其他地区也可以有自己的研究传统，不一定仿照北美的特色。比如重视对语言和文化词汇的研究，这是理解一个地区历史的基础。要了解当地的语言、世界观和经历，就必须通过语言、文学、戏剧、社会研究、人类学等跨学科的角度来做，这是进入地区研究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思想世界的唯一途径。

过去一两年里，世界涌起亚洲研究热潮。一种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和区域的历史叙述不再适用相关研究，他们认为，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区或是一个文化单元是不合理的。如果将这些单元（国家和地区）视作容器，就不会认识到跨地区的流动、人口和文化的分散、思想的交流、贸易的循环和商品的循环等等。但是，正如历史学家们所说的，为什么我们要停留在这些想象的边界上呢？像地图上所显示的穿越东亚和东南亚的主要捕鱼路线那样，为什么不能研究这些联系呢？社会和文化并不会局限在某个特定的文化单元里，恰恰相反，实际上正是物质文化和经济流动创造了领土，领土不创造也不包含物质文化，而是流动创造了地域的集合体。所以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观点，

这意味着要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这些地区。

Aung-Thwin 教授表示，当我们思考东南亚历史的叙事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东南亚的历史中早已暗示了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存在，该如何看待长期以来社会组织的多种形式，比如村民、王国、村庄、修道院或商业协会，它们如何成为民族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如何在一个国家的历史甚至是区域的历史中展示他们的经历？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与如何看待民族国家历史以及区域历史有关。而他今天要谈的就是将社群作为历史叙述的框架。社群的构成和历史涵盖社群的流动性等任何与社群相关的事，对社群历史的研究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将社群作为历史叙述的框架，是要将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的方式融入其中，而不是摆脱它，因为民族国家概念对于许多来说依然很重要。

Aung-Thwin 教授指出，社群是一个较老的概念，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学传统的一部分。社群形成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叙述结构来讨论过去和现代的历史。我们总是很擅长谈论前现代东南亚的历史，讨论中国与东南亚、印度与东南亚的互动以及这些群体带来的影响，还谈论西方化和伊斯兰化对东南亚造成的影响。只是当我们进入殖民时期，边界开始出现了，也带给了我们挑战与迷惑。他认为，社群可以容纳各种经历和关系，它是一个跨时间和空间的、反社会聚合的术语。社群的概念让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作为更广泛的社群的一部分，也可以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这使得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各种微观的历史，比如一个小镇的历史，甚至一个

小群体的历史，一个大学的历史。它也可以扩大规模，讨论更广泛的区域社群。

Aung-Thwin 教授结合缅甸的情况深入地讨论了社群历史与民族国家历史的竞争、与区域史的竞争，阐述了社群作为一种方法和理念的潜力。他表示，如果选择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例如一个市场——作为一个社群整体——缅甸人的市场。他们的互动尤其是缅甸女性们在她们自己独特的社群中的互动，也许和她们在家庭里的互动截然不同。所以当我们以民族国家历史为框架进行研究时，领土范围会限制了我们的叙述。

对缅甸民族国家历史的研究者有貌丁昂，著有《缅甸史》；著名的历史学家丹吞博士，在缅甸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剑桥博士丹敏吴，著有《现代缅甸的形成》。可以看到，民族国家历史仍然在区域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自 1988 年冷战后，有很多记叙其他群体的历史，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大多数人的历史却被边缘化了，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通常都是少数群体被历史遗忘了。但在英语世界中，对边缘群体和少数民族的关注仍是如此之多，因此 Aung-Thwin 教授决定编写一部有关缅甸社群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个问题，对于以政治中心、精英阶层为主的民族国家历史而言，国家是唯一的历史主题，一切都指向了国家。这种情况阻止了特权的统一、共同的凝聚力和一系列连续的变化，导致了历史叙述的单一轨迹。以社群为框架编写历史是考虑到当时缅甸仍未统一，在时间线上没有连贯性，因此民族国家的概念仍

然很重要，它实际上是时代的反映。

Aung-Thwin 教授认为，区域研究被视为一种扩大认识该地区部分特征的动态、模式和过程的方式，无论是通过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区域贸易，或者是传教士、旅居的佛教徒和当地的互动，都是区域学者一直感兴趣并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但是，这些并不是所谓的区域研究的内容。另一种区域研究的角度是关注流动性和少数群体，以此作为超越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的一种方式。比如对移民的研究，显示了跨越国境的人口流动情况，这对某国的历史叙述很重要。但同时，在一些特定国家中，国内人口流动或季节性迁徙，包括整个地区季节时节变化等等，也都是影响其历史叙述的重要因素。最新的一种研究方法是边缘研究，即不关注中心和国家叙事的方式，而是把目光投向那些在边界地带的社群和区域。这种研究考虑的不仅是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那种跨越国界的方式，而是整个边界地区都有自己的中心和他们自身独有的关系。因此，这就为其他历史学者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民族国家史叙述的方法，或者说是为从外部挑战民族国家史提供了从外到内的视角。这对于亚洲研究来说也很有意义，如果我们身处边界，那我们该从哪里入手研究？

Aung-Thwin 教授认为，当前历史研究方法存在以下问题：（1）仍是一个二元思维的框架。不是中心就是边缘，不是多数就是少数。这些历史从来就没有合并过，它限制了平行经历的纳入，它不允许我们在谈论民族国家建设的同时谈论次级的社群形成。它不允许我们谈论那些从中心

开始的国家建设者，也不能在地方层面上谈论他们归属感的形成，因为这种归属感要么挑战中心，要么随中心一起发展。它也限制了区域历史和次区域历史的叙述，而只是关注那些外围地区，或者是高地。比如对于东盟来说，这些国家是如何开始走到一起的，（区域）合并、基础设施和身份认同三者又是如何体现在历史叙述中的？（2）未能同时提供一个框架来解释一致性和差异。现在的学者们总是讨论差异、变化、分裂、分歧，但是 20 或 30 年前，他们谈论的是一致性，现在又转而谈论差异性。该如何同时谈论这两个主题？（3）没有将这个国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它只是一个孤立的主体，没有什么先于它之前，也没有什么跟随于其后。因此，这种方法未能在更广泛的东南亚历史背景下认识一个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一个政体，同时又与其他政体发生着关系。

不过，区域研究的方法也招致了批评。区域研究的观点认为，可以将亚洲划分成颜色整齐的区域，这样绿色的东亚地区就不会和橙色的东南亚地区混在一起，或者粉色的南亚地区就不会和蓝色的中亚地区融合在一起。它们都是“独立”的，就像拼图一样，无法混合。但从历史上看，事实并非如此。有人认为，区域研究是出于冷战的原因而受到资助的。从美国的立场看，他们想要通过培训语言专家等方式，了解所要面对的目标的生活区域。但事实上，他们就和旧殖民时期的学者们一样，作为东方主义者远眺亚洲，对亚洲做出判断。这导致亚洲被视为一个区域单元，它限制了传输和流动过程的分析，整个地区和地区主

义都僵化了，只是把文化和社会放在这些独立的单元里。

现在，交互研究提出的观点是，我们要开放这些区域，不要把这些区域看作独立的单元，而是把它们更多地看作是流动的，或者是有很多“洞”的，这样研究就可以穿过这些区域。这些区域是更广泛的网络和流通社会网络中的节点。我们不应该把重点放在定义每个区域，而是界定其中的实际流动，关注是什么在连接这些区域，而不是如何去定义假设这些区域。这种研究似乎也有问题。比如跨亚洲研究倾向于优先考虑海上经验，如远洋客商，贸易商贩，在海上旅行的人们，即更倾向于关注城市之间的空间，以及海岸线上或者与更广阔的海洋世界相连的政治体。但那些生活在更为农业化社会里的人们有着不同类型的经济和生活方式，他们的社会中没有与海洋社会类似的循环，在这项跨亚洲研究中，他们又该被放在什么位置？由此一来，这种研究方法并不能真正解释那些流动性没有那么强的社会类型，这类社会主要属于农业文明，但并不没有排除贸易，只是他们中心地区的基础依然是农业。尽管它也解释了变化和差异，如语言的混合、身份的混合，但并不能解释每个单元的特性。所以这种跨亚洲模式，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Aung-Thwin 教授提出，他正在思考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以“社群”为研究对象的方法。这里的“社群”是一种基于地域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一种用来代表某种社会联系的空间概念，范围可大可小，可以通过信仰、经济或血缘来维系。它可以代表一个广泛的传统，也可以代表

一个理想的关系，社群中的成员是被相似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吸引在一起的吗。对于“社群”的研究是跨学科的，比如是什么因素将人们维系在一起，经济关系还是个人关系，自愿行为还是强迫行为，婚姻关系还是血缘关系。研究者可以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甚至人类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社群的特征允许研究者从种族、阶级、政体和宗教等多方面来定义它。

社群可以被看作是既定秩序中的一部分，比如政府；它也可以包含非政府组织或非联邦状态，可以囊括不同类型的群体。需要强调的是，社群经常以不同的想法、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这也使人们得以讨论如何解释冲突。通常，当你对社群有质疑时，当人们对某个群体中的某个特定问题看法不一致时，无论是“我们属于”、“你不属于”这个群体，还是“他们没有征足够的税”、“他们在为这类事情纳税”等等，社群都会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有些人可能会选择通过他们使用的语言，穿的服装，参加的仪式……所有这些表达都可以作为理解社群的方式。同时，时间的限制也被打破，可以观察从古代到当代的不同社群，看看不同的社群是如何形成和组织的，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社区可以运用不同类型的证据、物质表现、文学文化作为表达方式。比如东南亚学术群体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一个社群。通过学术问题来谈论东南亚领域，学者们实际上是在构建社群，它允许我们在学术上容纳不同的想法。所以，即使我不同意你关于缅甸历史的看法，我

们仍然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依然在社群中讨论，通过社群能够找到沟通彼此差异的桥梁；能够比较不同形式的社会活动群体，无论它们是原始的还是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抑或是其他什么类型的。这就是社群的潜力。

Aung-Thwin 教授表示，他在课堂讲授由社群构建的历史时是从早期地区的城市化社群开始，进而讲到特许社群或古典国家、商贸集散地的出现，这些类型的社群和殖民地社群如何融合成一个国家社群和一个地区社群。社群提供了一个不依赖边界的框架，社群也总是在流动。比如，从移民到旅居的群体，甚至对于那些几乎总是住在相同地方的人也一样，包括了移动社群和原地社群两种类型。它是包容的，允许我们谈论不同的群体，无论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还是在不同语言、宗教、阶级、教育、性别等基础上。

Aung-Thwin 教授称他自己是一个“超级混血”——缅甸菲律宾人，从父族看，他的父亲是孟人和克伦人的混血，祖母有一个英国父亲，实际上也带有中国和印度的血统；从母族看，他的母亲是西班牙-墨西哥混血。因此，如果要以一种非常包容的方式来谈论缅甸人，那谈论的对象就应是缅甸人的社群和包括缅甸人在内的当地族裔的社群。这种方法不会挑战民族国家概念，它只是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来进行讨论，探索不同的世界观。它可以展现出那些在岛上的人和在地的人对世界可能有着不同的看法，城市和农村里的人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有着各自的优势。

对社群的研究能使我们以更广泛的视野审视不同的文明，而不只是局限于亚洲的价值观，或广义上亚洲人所看重的事物。所以对于跨欧亚的群体来说，社群让我们有足够的空间讨论他们，给予我们看待缅甸内部互动的基础。要想从亚洲秩序中看缅甸，就应考虑以下一些问题：如何看待缅甸内部的互动？如何看待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如何以自己的经历对缅甸进行界定？他们追求什么样的政府模式？哪些人属于缅甸人？法治是什么？这些问题对于不同的人来说都有着不同的释义。Aung-Thwin 教授认为，既要研究不同社群间内部的差异和变化，也要研究各社群间存在的联系；既要研究那些有着独特经历的群体，意识到少数群体的诉求，也要从整体性上关注社群全体成员的意愿。

Aung-Thwin 教授最后总结称，基于社群的历史研究其潜力在于可以容纳不同的经验，以历史的角度谈论身份，并且吸收了文化研究的范式和方法。它能够让历史研究者从书本、文学、舞蹈、服饰等方面获取在单纯的历史研究中关注不到的东西。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 Barbara Andaya 曾提出，历史是可以被书写的，经由书写者的编织和雕刻以达到某种平衡状态。换言之，文化研究模式下对过去的表达是可以超越历史的。参考的文本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使得研究者得以接纳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社群的不同观点和他们的各自的世界观，并对它们进行整合。这种历史研究包含了从中心到外缘，从主体民族到少数族群、边界区域的视角，包含了对民族国家的凝聚力、

希望和冲突（即东南亚历史上以及当代的危机所在）的解
释。